

●现代经济系列●

汤剑松 著

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经济系列●

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

汤剑松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汤剑松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6

ISBN 7-216-01413-8

I. 国…

Ⅰ. 汤…

Ⅲ. ①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N. F120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22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电话(027)5829493】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75 印张 1 插页 118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620

© 定价:6.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社会总供求关系分析	(4)
一、几次出现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5)
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	(9)
三、持续的财政赤字与信用膨胀	(14)
四、对外贸易的引致作用	(18)
五、明显的通货膨胀	(20)
六、抑制过旺需求 增加有效供给	(22)
第二章 财力分配分析	(26)
一、多种所有制使剩余产品的占有趋于分散	(26)
二、多种经营形式使国民收入趋于分散	(31)
三、国民收入的撒漏使其占有进一步分散	(35)
四、企业经济利益分配结构扭曲	(36)
五、行政经费增长过快	(39)
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适当集中财力	(43)
第三章 产业结构分析	(55)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56)
二、农业生产徘徊不前	(59)
三、工业发展速度过快	(62)
四、加工工业发展过快	(65)
五、能源、交通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 滞后	(66)

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69)
第四章 经济效益分析	(78)
一、经济效益低下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致命伤.....	(78)
二、企业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的原因.....	(81)
三、企业亏损的原因.....	(83)
四、农业生产效益水平普遍不高.....	(87)
五、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90)
第五章 经济关系分析	(99)
一、传统体制下所有制结构与公有制实现形式	(100)
二、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 过程.....	(105)
三、目前所有制结构的时点态势	(114)
四、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历史的局限性	(121)
五、改善所有制结构,促进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	(128)
六、探索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 推进制度创新	(132)
后 记	(147)

前 言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十五年的历程。目前,正朝着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设计的基本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五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非国有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领域到科学、教育、政治领域,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正在转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广泛展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资源力,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据测算目前居世界第五位;经济力,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等指标测算,列为世界第八位;科技力,包括国家重大科技成果、科研人员情况等指标,处世界第九位;教育力,包括教育普及率、教育质量等列世界第十位;文化力,测算结果列第八位;国防力,据评比目前居世界第三位。

虽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按照“复苏—高涨—紧缩—停滞”四个阶段来划分经济波动的周期,我国过去十五年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可划分为四个周期。1978—1982年为第一个周期。1976年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急于恢复遭极“左”路线破坏乃至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于是大上建设项目,工业生产过度扩张,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从1980年起进行三年经济调整。1983—1986年为第二个周期。1983—1985年高速扩张,再次导致主要结构关系的失衡,不得不于1985年四季度实行紧缩政策。1987—1990年为第三个周期。1987—1988年的急剧扩张,使工农业关系、加工业与基础工业关系更加紧张,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结果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1991—1993年可作第四个周期。1992年由于金融调控体系的功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一些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以及金融秩序混乱等新情况。为了使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健康地进行下去,党中央及时地采取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从而使经济发展在1993年下半年逐步趋于正常。透过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概括地讲:一是多次出现投资规模过大,社会总需求增长过猛的情况;二是需求膨胀与结构失衡并存;三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总体经济效益水平仍然不高,国有企业亏损额长期居高不下;四是信贷规模太大,财政、金融形势严峻;五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转变经营机制进展缓慢,等等。

在新旧体制转换过渡时期,出现上述问题是不足为奇的。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在削弱;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尚处在逐步建立阶段,目前还不成熟、不规范。况且,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经济均衡发展是相对的,非均衡发展是绝对的。两种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存,必然会出现一些漏洞和问题。从本质上讲,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在深层次上

发生根本变化,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使我国目前出现的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继续长期保持下去。系统地研究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既有浅层次的,也有深层次的。所谓浅层次的问题,是指经济过热、需求失控、流通秩序混乱、通货膨胀明显、物价上涨幅度过大。深层次的问题,包括较深层次的问题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前者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效益水平不高,后者是指经济关系不顺。浅层次问题是同深层次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由深层次问题引发出来的。并且共同对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必须从供求矛盾、财力分配入手,来探讨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关系等深层次问题。重点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需要说明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在时间跨度上,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五年为研究区间,有关章节为了分析的必要追溯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但重点以 1983—1990 年三次经济波动周期为主。在分析方法上,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以实证分析为主。

第一章

社会总供求关系分析

对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研究,在我国虽然研究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社会总供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总量中的一个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对立统一范畴。需求是以货币表现的社会需求。需求的满足意味着产品使用价值在消费中实现。需求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居民的货币水平和生产者为购买生产资料拨出的资金额。供给通常是指能够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的产品,它反映了以商品形式表现的生产成果。社会总供求关系的状况,在市场上以价格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供求之间互相适应的可能性,但是,能否成为现实,还需要有一系列的经济条件。我国几十年建设和发展实践表明,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产品相对短缺,即供应不足,需求过旺和供给与需求在结构上发生错位。

一般来讲,经济生活中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终极原因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起始原因,却在于忽视了综合平衡。从分配环节看,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不平衡会引起财政赤字和信用膨胀。如在既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又不使经济过热;既保证居民消费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逐步提高,又能通过加强和

改善宏观调控,有步骤地推进价格体制改革来调节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数量,确定合理的需求结构,是我们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严峻课题。

一、几次出现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深化经济体制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就必须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供求总量不平衡的矛盾,由于低消费和经济运转的低效率而受到相当的抑制。改革十多年来,虽然我们打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焕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和能动性,但并没有完全根治旧体制的弊端,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也没有及时地建立健全起来,供求不平衡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整个经济的运行。

特别是198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然而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却日益突出,社会总需求远远大于社会总供给。1988年社会总需求比上年增长22.6%,社会总供给比上年增长19.3%,供求差率达16.2%。1989年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差率仍在8%左右(参见《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章钟基》《瞭望》1990年12期)。

对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这种非均衡状态,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有“需求不足论”和“需求膨胀论”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我国总量不平衡的问题非常复杂,仅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来判断需求膨胀或需求不足不仅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也很难彻底地说明问题。从总体上讲,我国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关键在于新旧体制交替,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弱化,而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尚未健全,社会总需求从此膨胀起来。

(一)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给需求迅速扩张提供

了条件,引发了供求矛盾。

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明显增长,消费需求急剧扩大。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扭转过去长期存在的重生产,轻生活,高积累,低消费的不合理状况。但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的局面。1987年与1978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2.2倍,而居民收入增长3.9倍。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8.3%提高到1987年的58.6%,这种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格局的出现,带来了居民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大。

预算外收入迅速上升,既给投资需求提供了基础,也为消费需求扩大增添了可能。随着扩权让利、承包、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的推进,地方财政、国营企业和主管部门以及事业行政单位的预算外收入明显增加。1989年,全国预算外收入2700亿元,比1978年的347亿元增7.7倍多,它对搞活经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使用方向也存在不合理状况,轻生产投资、重非生产性投资及生活支出比较突出。预算外收入用于职工福利奖励的支出,1987年比1982年增长一倍多,超过同期劳动生产率提高43.6%的速度。

投资决策的分散化,加速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进程。在国民收入使用额既定的情况下,预算外投资比重上升,预算内投资比重下降。1987年和1978年相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比重由41.2%降低到13.1%,而预算外投资比重则由58.8%上升到86.9%。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及个人投资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中,这种投资格局变化趋势变化更为明显。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77.7%下降到1987年的32.7%,而预算外投资所占的比重,则由22.3%上升到67.3%,给国家宏观调控加大了难度。

消费与积累同时扩张,激化了供求矛盾。改革初期,国家为改

变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偏低状况,对基本投资规模控制得较紧,掩盖了一些矛盾。1979年至1984年,全国新增国民收入使用额2726亿元,其中74%用于消费,26%用于积累。近几年来,在消费需求继续较快增长的同时,为兼顾积累,投资需求也出现较快增长的趋势。1987年和1984年相比,消费需求增长59.7%,投资需求增长53.3%,致使社会总需求连年超过社会总供给。

(二)生产的非货币化与需求的货币化,形成局部供求之间的断裂带,这是刺激供求矛盾突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建筑行业迅速发展,住房商品化未大面积摊开,住房仍然是福利型的低房租实物分配,这种作法不仅不能调节供求矛盾,相反还扩大了供求之间的差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产业发展加快,货币化进程却较慢,免费低价供应的情况依旧比较突出,也造成了供求之间的差距拉大。十五年来,第三产业产值是三个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但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制度,交通运输的低价运行,各种服务设施的非商品化,都极大地扭曲了实际供给能力的扩大,影响总供求不均衡。

一些产业的非商品化,导致居民消费结构的畸形发展,相应的使一些消费领域供不应求的状况日趋严重。长期以来,由于不注意拓宽居民的消费领域,培养居民的投资意识,树立风险观念,造成居民手中的钱投向不广的状况,大都花在吃穿用上面。城镇居民用于吃、穿和购买其他商品的生活支出占其全部支出的比重达91%以上,而非商品支出,如交通、文化娱乐等,仅为8.5%,比例之低为世界罕见。

(三)投资规模大,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不高,扩大了供求差距。

建设投资增长快,但非生产性建设比重过大,影响了生产能力的增加,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综合投资效益不高,创造同样的社会财富,我国的投资要比这些国家高50%左右。

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不畅,使资源难以优化配置,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例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国有 7000 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有三分之一闲置和利用不足。在生产企业中,约有 2000 万人“在职失业”,劳动效益低下。

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屡禁不止,问题十分突出。受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追求近期地区利益倾向的影响,使我国产业结构呈现明显的趋同性。它往往容易诱发对国内资源的争夺,象蚕茧大战等,助长市场波动,价格上涨。

(四)改革不配套,各种非经济因素强化了供求矛盾。

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乱发奖金、津贴和实物,扩大了不正常消费需求,据了解,1988 年元月至 8 月,职工奖金达 214.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4%。

农村城市化进程过快,增加了供给压力。1989 年初,农村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力就达 8000 万人,其中进城从事经营活动的约有 2000 万人,农村集镇由过去的不足 3000 个,增加到现在的近一万个。截至 1990 年底,我国有省级行政单位 31 个;地级行政单位 151 个;地级市 185 个,县级行政单位 1093 个,县级市 279 个,市辖区 651 个。1990 年与 1989 年相比,县级市增加 17 个;自治县增加 2 个、市辖区增加 3 个,县减少 18 个(见《1990 年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经济日报》1990 年 12 月 29 日第 2 版)。这些变化,不仅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增加了对城市商品供应的压力。

流通环节多,层层加价,乱涨价现象也较普遍,推动了物价的上涨。

宏观调控手段和客观形势发展不相适应,出现了一方面行政放权让利,另一方面经济秩序紊乱的现象,扩大了矛盾。特别是社会集团购买力急剧上升,居高不下,产生的消极影响较大。

(五)进出口之间商品流程呈逆向发展,互补关系较差,加剧了

国内市场紧张。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出口商品中相当一部分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和资源产品等国内紧俏商品,过剩产品比较少,而进口商品中,主要是生产资料。进出口商品这种不对称,势必减少国内市场消费资料的货源总量,形成国内消费品购买力需求与国内消费品供应之间的断裂带,拉大了供求之间的缺口。

国内外商品价格水平的差别触发了地区之间的盲目抢购,引起国内市场价格波动。

由于外商合资、合作、独资企业的高收入分配制度,对国内消费购买力的扩张刺激较大,助长了攀比收入的倾向。这样势必对国内供求关系产生影响等等。

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

社会需求是居民个人消费、集团消费、投资资金和政府支出以及出口与流入资金之和,其中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种形式。上面我们在研究总量失衡时,对社会需求膨胀各构成要素逐一作了鸟瞰地分析。现在我们着重研究社会总需求的两种形式——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问题。

在消费需求方面,1984年至1988年,我国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消费需求年平均递增22.2%,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19.7%。此外,从待实现的消费需求看,1988年底,全国城乡居民结余购买力达5499.6亿元,比1978年底的382亿元净增5117.6亿元,相当于1988年国民收入生产额的三分之一。1989年底,全国城乡居民结余购买力为7007亿元,比1978年净增6625亿元,增长17.34倍。1993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年末存款余额达到14764亿元,比上年增长28%。

导致消费需求膨胀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

1. 政策性原因。改革十五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开放、搞活的路子走的,具体政策措施主要是放权和减税、让利。因而带来了消费需求大大超过消费供给的增长,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况。

当然,这里面也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如对个体、集体(包括乡镇企业)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是在经过十年动乱后大量知识青年返城的1980年制定的。当时,为了安置大量的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同时鼓励发展个体、集体经济,因而对个体、集体经济在税收、贷款、货源采取优惠照顾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修改宪法条款中,明确承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政治经济地位后,对各种减免税的优惠政策未进行相应的清理和整顿。

2. 收入分配体制的原因。十五年来,我国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进行了一些改革,居民收入来源由过去单一的工分、工资向多元化转变。但对城镇的收入再分配体制不仅基本没有触及,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种再分配体制包括各种粮油等主副食品、水、电、煤、交通等公共设施费用以及住房、养老、医疗等劳保福利补贴。这种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纯福利再分配体制,使国家、企业日益难以承受,同时也使居民收入的增加与消费领域狭窄的矛盾更加突出,触发了消费需求膨胀。

3. 宏观调控体制的原因。经过十五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形式和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预算外收入已接近财政预算内收入。但是,我们的宏观监督调控体制和有关部门的职能基本上仍保留着产品经济的职能,很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格局。如国家计划部门还未建立平衡全社会消费需求与供给职能和体系,财政部门至今只有监督预算内的国有企业与单位的老手段,没有一套统管全社会多种经济形式的监督体系和财会成本条例;税法与税收软弱无力,税收队伍和设施远远跟不上税收征管工作的要求,特别是

对各种所得税的征管基本上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劳动部门基本上只管预算内全民及大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分配政策,等等。

4. 认识上的原因。经过十年的文革动乱,从上到下都深刻认识到必须加快建设和改革步伐,但是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特别是1984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用大量外汇进口了高档消费品或引进高档消费品生产线,吊高了人们的消费胃口,促进了消费早熟,消费超前。

在投资需求方面,我国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83年为1430.06亿元,1988年剧增到4496.55亿元,5年增加了3066.49亿元,增长2.14倍;199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7.6%;1993年上半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70.7%,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可能突破亿元大关,增幅在3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国的国力的可能,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之一。投资需求膨胀原因十分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是:

1. “分灶吃饭”、“层层包干”的财政体制为地方投资创造了环境。1980年以来,财政先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1987年,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又以各种承包方式确定了两者的分配关系。无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包干,或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承包经营,其目的均在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一初衷是对的,在实践中从某种程度上也得以实现,然而却同时也使财权过余分散,导致投资来源分散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上产生的问题,成为推动投资膨胀的重要方面。首先,在财政包干体制下确定的收入任务和增长速度,从总量上推动地方、企业投资膨胀;其次,财政利益的区域化,从结构上导致地方投资的失衡;最

后,财权与投资权同时下放,为地方竞相投资提供机会。

2.“税前还贷”的财政政策为企业投资冲动提供了条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市场条件及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企业每一投资不一定能都达到预期目的,投资效益好则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投资失败不但不能带来新的产出,相反还要赔本付息,因而企业每一笔投资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正因如此,使得企业在投资决策与行为上慎之又慎。然而,实行“税前还贷”却使这一风险机制的约束作用得而复失。“税前还贷”办法规定,企业投资贷款用投资后新增利润和税款还贷。由于在实际中,贷款项目的新旧利润很难划分,即使决策失当,也可以用企业原有资产所创造的利税归还贷款。因而,企业所有投资贷款的归还实际上大部分来源本应上交国家的利润和税金。如果按现在的最高利率40%来计算,企业每笔贷款的归还,财政承担60%,企业自身只承担40%。在目前,“大锅饭”还没有完全彻底打破。企业依旧存在负盈不负亏的情况下,这仅有的40%的风险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出去,最终由国家承担。很显然,企业在“税前还贷”制度下的每一笔投资对于企业有益无害。投资成功,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收益;投资失败,可动用老利润归还,向国家转嫁负担。不宁唯是,“税前还贷”办法规定企业可照提“两金”(即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既保了企业利益,又不损害职工个人利益。这种对企业有益无害的投资行为,企业何乐而不为,因此引导了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

银行是担负一定行政职能的经济实体,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必须计较自身的利益,只要能收回投资获得利息,便可投资。“税前还贷”推出国家财政这一强大的还贷后盾,无论企业投资效益如何,银行贷款还本付息总是有着落的,不存在任何风险,因而银行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面对企业强大的投资贷款,几乎是敞口供应,这一行为又倍受地方政府的青睐和支持。1984年至1987年,全国投资贷款平均每年递增47.7%,从而使贷款占全社会投资资